

# 现代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成因与处置：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经验与启示

孟科学<sup>1</sup>, 闻德美<sup>2</sup>

(1. 山东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1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湖北 武汉 430074;

2. 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文章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各次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成因与处置进行了梳理分析。研究认为, 90 年代以来各次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理论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及其政策推行, 以及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失与国际协调机制的缺乏。严重依赖外部因素的宏观经济失衡、经济非理性繁荣、地产泡沫膨胀以及金融过度且监管缺失是屡次危机爆发的关键共性因素。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处置要考虑危机的成因、宏观经济条件、金融体系的稳健情况、金融体系的风险传导等, 以此为依据来选择适当措施, 其中危机爆发后的流动性管理最为紧迫。这对我国今后管理危机下的经济问题能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 系统性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思潮; 市场信心; 金融体系流动性

中图分类号: F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13)05-0070-06

## 一、引言

对经济体系中以系统性风险为题的研究可追溯到威廉·夏普(1964)对系统性风险的认识, 他将系统性风险定义为多元化投资无法规避的风险, 这可以视为系统性金融危机产生的微观基础定义。FASB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简称“FASB”)和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 (2009)把系统性风险定义为金融系统的整体或部分减值而产生的、可能给实体经济造成潜在负面经济后果的金融行业崩溃的风险。目前, 关于系统性金融危机尚未形成广为接受的、统一的定义。由于与其他经济社会部门相比, 金融体系有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高可能性和高损害性,<sup>[1]</sup> 因此, 当前对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研究已不限于金融风险传染性和金融脆弱性, 以及个别金融机构失败的负外部性对金融系统的影响, 而更侧重于金融市场中所产生的系统性冲击及其引致的金融系统整体功能的丧失。<sup>[2][3]</sup> 实际研究中, 学者们更多的是基于宏观角度, 将系统性金融危机描述为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了较严重的混乱, 并波及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危机,<sup>[4]</sup> 危机的实现是在金融体系中长期酝酿和积累的系统性矛盾的集中爆发。现代系统性金融危机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新近爆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为代表, 暴露了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历次金融危机既有差异也有共同点。系统性金融危机并非由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单个因素引起, 而是经济结构失衡、政府监管缺失、金融创新异化、国际协调机制缺乏、经济与金融霸权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综合结果。系统性金融危

收稿日期: 2013-08-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投资消费信心与金融系统互动机理研究”(11YJJCZH200); 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2012M521510)

作者简介: 孟科学(1975-), 男, 陕西富平人, 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金融学博士, 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机对我们以往的经济增长思路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在这个相互关联、影响并且日益相互适应的全球系统下,是否经济快速增长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在国际协调机制缺乏的背景下,长期以来忽视经济结构内外失衡的经济体,其经济与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支柱究竟是什么?处置剧烈震荡的系统性金融危机所要遵循的、至关重要的行为准则究竟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重新思考和认识,既需要管理当局决策方式的更新,也要求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在行为上做出重大转变。透过对最近几次全球系统性金融危机成因与处置的分析,能为我国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危机提供借鉴与启示。

## 二、现代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成因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系统性金融危机通常在特定国家的特定产业领域被引爆,后果不只是对财富泡沫的摧毁,更重要的是引起我们对以往发展思维与行为模式的质疑。虽然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与蔓延的原因错综复杂,但透过盘根错节的表象,我们仍然可以让危机的因果在经济发展的底片上逐渐显影。

### (一)现代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理论根源: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政策主张的推行

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与现有的美国影响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内在紧张与矛盾,<sup>[5]</sup>屡次爆发的系统性金融危机无疑是国际体系变迁中各种矛盾冲突的表面化,而最近的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也是这种矛盾激化的集中释放。90年代以来各次系统性金融危机,尽管其引爆点、影响面及严重程度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推行,以及在金融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失与国际协调机制的缺乏。

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总是在放任自流的自由资本主义和政府积极干预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交替。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危机使凯恩斯主义政策消退,以“反凯恩斯主义”面孔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趁机兴起,逐步由理论和学术而政治化和国家意识形态化,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刘迎秋的观点,新自由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较快,并先后成为主流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多种新兴经济学分支和思想流派之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的总和,狭义新自由主义特指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和思潮。<sup>[6]</sup>我们通常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多是指狭义新自由主义,其本质特征是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倡导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在继承亚当·斯密自由市场思想的同时,极力地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和自我修复的功能,认为除去完善市场规则的任何政府干预都有害于市场的健康运行。Friedman Milton认为政府的总需求刺激政策引致了通胀和失业的相互强化,<sup>[7]</sup>哈耶克更激进地认为,正是政府的干预造成了失业和通胀共存,市场经济体制应该“去政府化”,<sup>[8]</sup>即彻底的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和无政府化。“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其政策主张的集中体现,其基本点可以概括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干预,实行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20世纪80年代美英政府首先接受新自由主义主张并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全面推行,其成功的经济结构调整使新自由主义在80年代达到顶峰,逐步成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此后,为适应经济扩张,其迫切需要加快经济全球化。1989年,为全球化服务的、新自由主义完成形态的“华盛顿共识”出台。“华盛顿共识”获得美国政府、华尔街以及其实际控制下的IMF与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IMF把推进以资本账户自由化为典型的金融自由化作为具体目标和责任,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也因此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目标之一。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国际资本流动突飞猛进,金融自由化蔚然成风,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前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都曾主动或被迫地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sup>[9]</sup><sup>75</sup>“华盛顿共识”催生了以高流动性为特征的新型国际金融市场,片面鼓励新兴市场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从而导致投机活动猖獗,加剧了新兴经济体的金融脆弱性。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拉美国家根据“华盛顿共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结果却是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等被西方国家称为“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改革样板国家,经历了 1994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2001 年阿根廷经济危机等一连串打击后已接连倒塌。亚洲国家出现金融危机也是在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开放资本账户后。事实上,亚洲国家实行过分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和政府过于脱离经济活动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最主要方面,关键在于因过度自由化而缺乏有效和审慎的规章来确保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体系的安全与合理。以韩国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其经济形势本来比拉美国家要健康很多,但是 80 年代后半期在“华盛顿共识”影响下推动经济自由化改革、开放金融市场、放松短期资本控制、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使韩国最终暴露在 1997 年恐慌性的资本外逃之下。<sup>[10]24</sup>

这次华尔街金融危机仍然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所致。在全球多极化趋势下,美国为维持在全球的支配地位,毫无顾忌地向全球超量供应美元,这直接导致全球性的信贷泡沫及前所未有的贸易失衡;贸易盈余国家的巨额美元外汇储备回流美国形成巨量流动性过剩,加之资本的逐利本性和不恰当的经济政策相结合,催生出美国疯狂的金融投资与信贷创造,当虚拟经济的信用创造超过实体经济的支付能力达到一定程度,信用创造会在实体经济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首先断裂,而新自由主义下政府监管的缺失等于主动放弃了对金融危机的防范,直接推动了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危机爆发及在全球的蔓延的过程中,现行的国际金融体制和协调机制难以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充分说明了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协调机制严重滞后于金融全球化发展进程的事实;而且国际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对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and 消除金融危机束手无策,在金融危机发生和蔓延时难以提供相应协助,助长了危机的恶化和国际蔓延。<sup>[11]2</sup>

## (二)现代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关键共性因素

尽管现代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的特点各异,但迥异表象的背后依然存在明显的共性因素,这些共性往往与一国经济管理当局的发展思路、理念甚至是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 1. 经济发展对外部因素严重依赖,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形成了危机的基础

从经济发展事实看,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忽视对经济结构的必要和及时调整的问题,经济增长模式过分依赖外部要素。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前,墨西哥引进外资的数额巨大,但第一产业投资持续负增长,基础工业发展缓慢,农业发展迟滞;虽然第三产业依靠外资取得迅速发展,但与国内其他产业缺乏有机联系,经济结构受外资制约,造成了失衡的局面。这种依靠吸引外资创造出的经济繁荣,最终导致大量短期资本迅速抽逃时爆发危机。东南亚国家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发展模式均为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过度生产依赖出口维持,经济发展的动力维系国外的消费需求,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很大;生产资金依托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对外资形成过度依赖,且未能有效控制外资流向、规模及结构,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单一化,经济发展形成虚假繁荣,出口优势弱化造成进出口失衡,国际收支数年出现巨额赤字。以泰国为例,泰国的外贸依存度 1986 年为 42.2%,而 1996 年高达 85%;1991 年到 1995 年泰国外债总额从 360 亿美元增加到 68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短期资金,到 1997 年危机爆发前,泰国国际收支赤字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0.2%。<sup>[10]26</sup>与东南亚国家不同,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依赖消费推动,但美国过度消费却依赖进口而生存,过度消费所需资金同样借助国际金融市场融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凭借事实上的美元本位,美国得以在全球透支信用支持过度消费,从而成为全球主要的经常账户逆差国。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从 1995 年占 GDP 的 1.5% 猛升至 2006 年的 6%,危机爆发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 8690 亿美元,比 2005 年增长 10%,约占全球国际收支逆差总额的 3/4,美国经济内外结构严重失衡。<sup>[10]26</sup>

### 2. 经济持续繁荣后非理性发展,地产泡沫成典型隐患

危机的爆发基本上都发生于经济持续繁荣之后。市场持续繁荣使非理性预期不断强化,市场泡沫持

续扩张,房地产市场成为市场泡沫的典型载体。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地区,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的经济都保持了年均约8%以上的速度,各国政府对经济前景充满信心,提出的经济发展计划更加激进。地产泡沫膨胀和蔓延与政府、金融界和地产业对亚太政治经济发展基本形势判断过于乐观密切相关。以泰国为例,1989年泰国发放的住房贷款总额为459亿泰铢,到危机爆发前的1996年超过了7900亿泰铢,7年内增加了5倍多,1996年地产投资额占外国直接投资额的一半左右。这8年间,泰国的土地价格一直呈快速上升趋势,其中前4年,地价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后4年地价的上涨速度更是高达40%;到1997年上半年,泰国全国积压的房屋已达85万套之多,房地产行业连续4年低迷,泰国银行业的房地产贷款达260亿美元,其中40%已成坏账,挤兑风潮使多家金融机构倒闭。<sup>[10]36</sup>自克林顿任期内美国经济持续繁荣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大力推行“居者有其屋”政策,尤其在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和“9·11”事件之后,为刺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至1%,达到美国46年来的最低水平,推动了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飞速膨胀,<sup>[10]38</sup>持续低融资成本下的地产价格持续上涨,促使美国民众不断进入地产领域,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至2007年底,家庭部门的负债率飞涨至可支配个人收入的133%,据标准普尔统计,美国房价变化指数从2000年1月到2006年6月上涨了约126%,成为危机的严重隐患。<sup>[10]39</sup>事后也证实,美国金融危机与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密切相关。

### 3. 金融过度加剧金融脆弱性,监管缺失成危机推手

金融过度导致融资领域中的风险积聚及趋于高风险的金融状态,不可避免地增大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打破了银行业与传统金融市场之间、衍生产品同原生产品之间以及各国金融体系之间的传统界限,此时任何导致银行不能正确评估风险的机制都是危险的,而金融自由化大背景下的监管缺失直接恶化了金融部门的稳健程度,最终酿成了危机恶果。东南亚各国在经济高涨时的过度乐观导致过度放贷和对杠杆的过度使用,并且通过保证金交易和金融衍生品等其他形式,进一步加剧了价格和产出的不可持续性;经济的快速成长,导致东南亚企业普遍高估地产供给、制造业的产能,加之经济发展过分倚重的外资主要投资于股市和地产等投资见效快的领域,投机心理强烈造成股市高涨、房地产盲目发展,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坏帐、金融机构资信下降、金融环境恶化。加之监管体系的不健全造成对外国银行的离岸业务及金融衍生工具监管不力,最终给国际游资留下了投机空间。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是多头监管、重复监管和空白监管同时并存,金融自由化过度导致金融创新链条出现监管空白,各种复杂的高杠杆性金融衍生品和证券化产品甚至没有纳入监管范围;恢复混业经营后的监管体制没有及时调整,导致监管缺失和错位。<sup>[11]9</sup>

## 三、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处置经验

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管理与处置是一项较长期的工作,尽管解决最初的流动性危机可能只需要几周的时间,且最初的措施往往都旨在恢复市场信心。<sup>[12]57</sup>适当而及时的政策可以将代价降至合理的、比较低的程度。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处理与正常情况下对金融机构的处置有显著不同,稳定时期恰当的行为在危机时期却有可能加剧不稳定性,使市场参与者进一步失去信心。在危机时期,金融机构的状况往往会迅速恶化,管理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真实情况了解有限,此时最重要的目标是稳定市场信心、保护支付体系、恢复清偿能力、防止宏观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这通常需要在危机出现的早期阶段采取果断的措施,但现实中,由于管理当局需要时间去认识形势的严峻性或者根本就否认危机事实,往往缺乏坚定的举措。2007年3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陷入困境时,金融危机已初显端倪,但美联储却错误判断了危机的发展趋势,货币政策在拯救危机与控制通胀之间摇摆,贻误拯救危机的最佳时机;<sup>[11]12</sup>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当墨西哥比索大幅贬值高达30%以上时,墨西哥政府取消了干预,希望以市场供求决定汇率以使其趋于稳

定,但比索继续大幅贬值,进而波及世界。此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美国、加拿大以及部分国际金融组织才向墨西哥提供贷款资金、稳定股市各种援助,最终这场灾难性的危机才以高昂代价逐渐平息。

系统性金融危机管理策略的制定需要考虑国家条件,主要包括危机的具体形成因素、宏观经济条件、金融体系的稳健情况、金融体系的风险传导等,以此为依据来选择可以使用的、恰当的危机处置工具,最为紧迫的是处理危机发生后的流动性问题。首先,金融机构的清偿能力必须得到保证,以帮助整个支付体系稳定,使得当局有时间找出危机的原因,进而制定合适的策略。中央银行的支持为金融体系流动性的短缺提供第一道防线。比如,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政府对没有破产的银行进行充分注资,向 9 家商业银行注资 360 亿美元,6 家主要银行中国家控制了其中 5 家银行 90% 的股权;美国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发生后,通过了 7000 亿美元的救市方案,计划通过购买银行的不良资产来增加其流动性。如果流动性不可得,当局在处理问题金融机构上可能需要全面担保甚至是行政性措施等更为大胆的措施——如冻结存款和资本管制等;其次,直接或间接清除金融体系中失去清偿能力或没有生存能力的金融机构,重建金融体系稳健性。原则上,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只提供给具有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对缺乏清偿能力的必须立即进行干预。此时,搞清遭遇困境的金融机构规模和分布是重要的,需要管理当局统一口径认真地收集数据,确立金融机构状态评估的标准,据此区分运营状态良好的金融机构、具有生存能力但资本不足的金融机构和难以生存且缺乏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生存能力的考察,往往要求金融机构基于现实的宏观经济假定制定中期的业务计划并做出现金流动的预测,以显示今后的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所有具备清偿能力但资本不足的金融机构都必须提出可接受的改革计划来配合资本金的重新充实过程,对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必须做出关闭、整改、合并或出售的决定。<sup>[9][77]</sup> 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成立专门的金融监管部门 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简称“FSC”),于 1997 年 12 月接管两家大型商业银行,暂时关闭 14 家商业银行,其中有 10 家于 1998 年 1 月被宣布永久关闭。<sup>[12][64]</sup> 2009 年 5 月,美国于危机期间对银行进行的压力测试也是事出于此,如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所说“……对全美 19 家最大银行的实力进行前所未有的评估。目标是估计未来的潜在亏损,并确保在经济衰退加深的情况下,银行也有足够的资本金用于放贷……该测试将向我们提供关于大型银行未来亏损来源的明确信息……加快我们修复金融系统的进程,为经济复苏提供更好的基础”;最后,当局可以遏制危机的恶化态势并且金融体系得到稳定,加强审慎监管将是重要的工作。危机管理策略最后的重点是不良贷款的财务重组——即调整贷款结构、贷款清算或者将贷款出售给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sup>[13]</sup> 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泰国,于 1998 年 3 月发布关于贷款损失分类和准备金计提的新规定,泰国金融部门重组局(Financial sector Restructuring Authority,简称“FRA”)处理的 8600 亿泰铢的金融公司资产,约 2060 亿出售给私人部门,约 1850 亿出售给后来成立泰国资产管理公司(Thailand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简称“TAMC”)。据估计,TAMC 大约取得金融部门不良贷款总额的 1/3,然后通过广泛而灵活的形式以债务重组、公司改组、抵押止赎等办法解决问题贷款。<sup>[12][71]</sup> 危机后的经济必然走过艰难的均衡重构过程。系统性金融危机成功管理的关键要求我们重建协调的整体宏观经济框架,经济政策的选取应该有助于人们重建对金融体系和未来经济的信心,政策组合取决于宏观经济不平衡的性质和金融体系的现实状态。货币管理当局在满足流动性需要、保护支付体系的同时,有必要采取对冲过多流动性的手段,以确保流动性支持不会造成价格方面的巨大压力,这对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提出了更多挑战。

#### 四、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启示与思考

索罗斯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写道:“我们要承认金融市场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基于的信念——放任金融市场,听任其自生自灭,金融市场就像一个钟摆,可能因外力干预而失灵……

但它终要回归均衡状态——是错误的。金融市场可以走到极端……金融市场真的不像一个钟摆,反而像拆房子的大吊锤,接二连三地击破各经济体”。<sup>[14]</sup>显然,未先建立起有效规制的框架而匆忙地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可能是致命的,政府在市场形成和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对此,反对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相互适应且密切关联的全球经济系统下,遭遇危机后的我们是否深刻地认识到以往发展路径的不可持续。历次的系统性金融危机提醒我们,经济高速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现代金融环境下,经济良性持续发展要求建立国内储蓄与消费的合理关系、平衡国际收支、避免对外部的严重依赖;金融市场的过度杠杆化是危险的,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强化监管的同时必须注意跨行业协调监管以及监管的顺经济周期问题;<sup>[15]</sup>防范危机或者与危机遭遇时,监管当局对危机干预应迅速反应,并以恰当的评估标准对金融机构进行诊断并区别对待,利用政府资金重新充实金融机构资本金是可行的重要方法之一;更重要的是,政府应当基于宏观经济状况纠正以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加强国际间处置危机政策的协调一致。

摆在面前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当今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以及客观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在重建国际秩序和加强多边协调机制的建设上付出更多的努力。我国改革所面临的内外环境的异常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主动及时化解经济和金融市场化改革中的矛盾,完善监管体系以建立有效的行为框架;我们也必须注意合理的确定市场和政府各自的行为边界以及行为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和金融改革必须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陷阱保持足够的警惕,也提醒我们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导致现代金融经济具有内在脆弱性,花大力气治理自身经济问题并探索一条既适合我国国情又与时俱进的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路径依然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 参考文献:

- [1]CORRIGAN E G. The banking-commercial controversy revisited[J]. Quarterly Review,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Spring 1991:1-13.
- [2]BORIO C. The macroprudential approach to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where do we stand?[R].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2003:128.
- [3]BORIO C. The macroprudential approach to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where do we stand?[R]. The Special Volume Celebrating the 2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Kredittilsynet,2007.
- [4]BERNANKE B. A letter to Sen. Bob Corke[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9-11-18.
- [5]严海波. 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与金融危机[J]. 国外理论动态,2008(8):1-6.
- [6]刘迎秋. 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反思[J]. 金融研究,2009(11):12-20.
- [7]FRIEDMAN M.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8,58(1):1-17.
- [8]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中译本)[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9]仇华飞. 对引发墨西哥金融危机原因的再认识[J]. 世界经济研究,2005(12).
- [10]李恒阳. 全球金融危机经典案例[M]. 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
- [11]谢平,邹传伟. 金融危机后有关金融监管改革的理论综述[J]. 金融研究,2010(2).
- [12]IMF. 金融部门危机与重组:亚洲的经验教训[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 [13]周小川. 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响应: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内在逻辑和主要内容[J]. 金融研究,2011(1):1-14.
- [14]乔治·索罗斯.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译本)[M]. 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 [15]张晓朴. 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演进、成因与监管[J]. 国际金融研究,2010(7):58-67.

(下转第 84 页)

[22]金辉. 国际旅游院校会展教育的现状和我国的差距[J]. 旅游科学, 2003(1): 5-9.

## A Study of the Competency Model of Project Manager of Professional Exhibitions

CAI Libin, CHEN Jinjian

(College of Manage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10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MICE indus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However,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exhibition talents has become a bottleneck, constricting it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questionnaires about project manager of the MICE industry, uses SPSS19.0 Statistics software to perform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n related data, and calculates the loading of component of competencies. Project manager of the MICE industry are required to enhance their abilities in aspects such as technical expertise,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personal traits and marketing public relations; while the enterprises can find suitable staff from this competency model.

**Key words:** MICE industry; project manager of MICE industry; competency model; competency elements

(责任编辑:魏 霄)

---

(上接第 75 页)

## Causes and Treatment of the Systemic Financial Crises: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since the 1990s

MENG Kexue, WEN Deme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90, China;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causes and treatment of systemic financial crises since the 1990s. The systemic financial crises stemmed from the impact of new liberalism and its policy, the inadequac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the lack of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imbalance due to excessive dependency on external factors, irrational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real estate bubbles, financial excesses under lax financial supervision are the key common factors of the crises. Handling the crises requires an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their causes, the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safe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risk transmiss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etc. Liquidity management is the most urgent upon the outbreak of a crisis.

**Key words:** systemic financial crisis; new liberalism ideological trend; market confidence; the financial system liquidity

(责任编辑:魏 霄)